

# 台灣人的民族/國家認同\*

施正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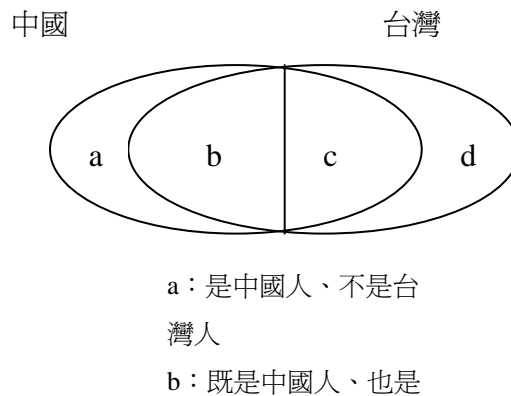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 壹、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或是國家認同

如果我們歸納國際上的政治學者對於台灣的興趣，在 1970 年代，大致上是專注於台灣的經濟發展奇蹟，特別是國民黨政府的「強國」(strong state)的角色；從 1980 年代末期起，開始有人注意到台灣如何由威權體制進行民主化，包括自由化、民主轉型、以及民主鞏固；時序進入 1990 年代，學者們把研究的重心逐漸轉移到認同政治方面。

就字面的意義來看，national identity 就是 nation's identity，指的是「民族的認同」(identity of nation)，可以簡稱為「民族認同」；然而，台灣一般將其譯為「國家認同」；其實，state identity (或是 identity of state)，才是指「國家的認同」。兩者雖然有關係，卻是不同的政治學概念；此種語意上的混淆不清，嚴重妨礙我們進行嚴肅的學術對話。

民族是指希望共同生活在一個國度下的一群人。當前台灣人民族認同的混亂，可由民眾自我認同的分歧依違於台灣人認同、以及中國人認同所看出（見圖一）。此外，台灣人這個概念至少有四種意思，包括鶴佬人／福佬人、本省人、台灣住民、以及台灣民族；同樣地，中國人也是歧義的名詞，可以指涉血緣上的華人、文化上的華人、以及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民，當然，也可以代表建構中的中華民族／中國民族。



圖一 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施正鋒**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副教授、台灣文化學院兼任副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系主任等職，現為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並擔任《國際和平研究期刊》執行編輯、《共和國》總編輯、《亞太歐盟研究期刊》編輯委員、國立中山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任副研究員、國際和平研究協會理事，專長領域包括：比較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經濟、族群政治；研究興趣主要為：和平研究、民族主義、政黨政治、選舉制度、經濟發展。施博士電子郵件為<[ohio3106@ms8.hinet.net](mailto:ohio3106@ms8.hinet.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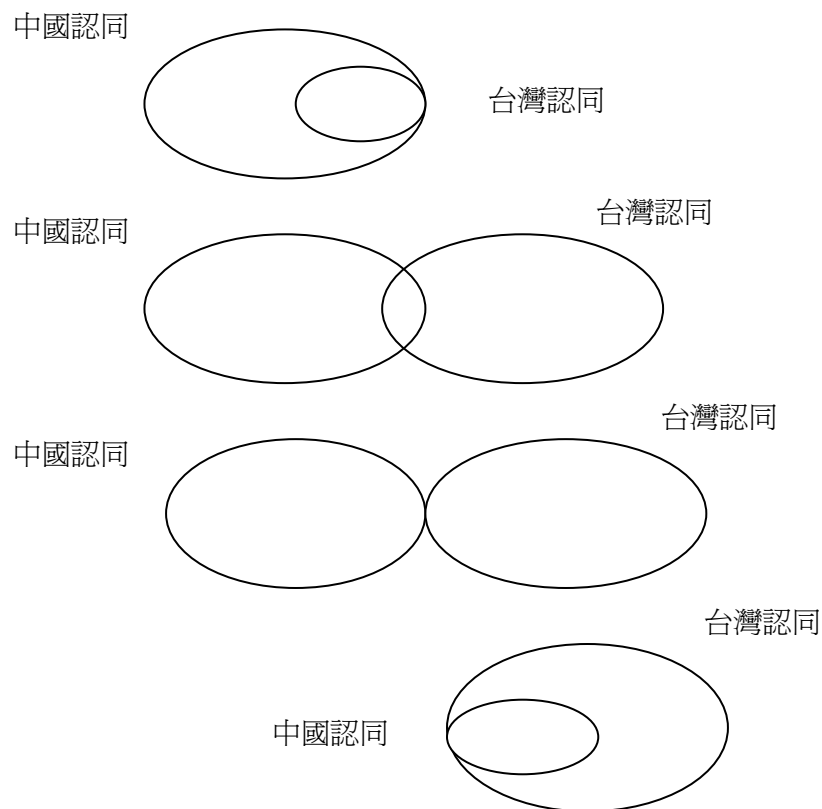
**Cheng-Feng Shih**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and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t Tamkang University, managing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editor-in-chief of *The Republic*, member of editorial board of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U Studies*, adjunct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Center of Taiwan Studies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s well as a council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Peace Studies Association. Prior to this, he was a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unghai University,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t Formosa College, as well as chai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amkang University. Dr. Shih's specialties include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ethnic politics.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 encompasses peace studies, nationalism, party politics, electoral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r. Shih's may be reached at <[ohio3106@ms8.hinet.net](mailto:ohio3106@ms8.hinet.net)>.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國家認同就是一個國家的自我定位，是經過不斷地互動、協商、學習、定義、及建構而成。一般而言，國家認同的建構要面對兩種課題：對內而言，國家認同除了會受到族群、政黨、以及利益團體的互動影響，也可能受到社會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的限制；對外而言，國家認同又受限於一國與他國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國家把國際環境當作競技場，在政治角力、以及社會化的過程中來建構、重構自己的認同。

隨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固著化，由「中華民國在台灣」遞嬗到「台灣中華民國」，目前政治人物的最大公約數就是「認同中華民國」。自來，國民黨政府所提供的國家認同，除了將國家界定在台澎金馬的疆土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建立在中華民國的名目上。長期以來，在中國的戰爭威脅下，如果說台灣的住民有甚麼共同點，最沒有爭議的，應該是反對目前的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而針對中國這個「重要他者」所發展的國家認同，也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人」。

如此的工具式 (instrumental) 國家認同妥協，當然也是受到頑固的原生式(primordial) 民族認同所左右，無法與歷史、或是文化上的中國作割捨；這樣被動的國家認同，卻又回過頭來制約台灣人的民族認同，讓人遲遲無法正面朝建構的(constructivist)方向去作想像。終究，台灣人必須要決定自己要如何來構思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關係。



圖二 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

理論上而言，有四種可能的認同安排方式(圖二)：(一)相互從屬是階層式的關係，將中國認同當作是上位、而台灣認同是下位的概念，因此，台灣認同必須向中國認同臣

屬；在這裡，中國認同才是國家認同，而台灣認同只是地區性的、或是藩屬式的認同。

(二) 在相互切割的模式裡，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有相當的交集，特別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色彩上，乍看之下，沒有主從的關係；不過，如果台灣認同、以及中國認同都是民族／國家認同，終將面對效忠優先順序的抉擇。(三) 在相互排斥的模式下，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無法相容，特別是中國正在塑造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之際，自是不能容忍作為政治個體的台灣。(四) 在相互建構的模式中，只有台灣認同是國家認同，而中國認同只是台灣認同的一部份；在這裡，並不是單向的強行將中國認同置入台灣認同，而是選擇中國認同可以接受的部分，並且要適度地加以改造。

## 貳、學者眼中的台灣認同議題

這本由法國學者高格孚所編的《未來的記憶——民族認同議題與尋找新台灣》，是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在 1990 年代末期舉辦的年度研討會，相關台灣民族認同論文的選集。這本書的主軸，是在探尋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民族認同是如何發展的。編者把這本書的安排分作三大部份，首先是三位作者由歷史記憶去搜尋台灣人認同的根源，再來，四位作者探討這些認同是如何轉變、以及表現，最後，三位作者分析族群分歧如何挑戰台灣民族運動的完成。我們概述如下。

歷史學學家 Andrew Norris 的論文在說明，台灣民主國之所以迅速潰敗，除了漳州人、泉州人、以及客家人因為彼此的歷史恩怨而無法團結以外，主要的原因是唐景崧的粵軍並非墾殖者，因此沒有捍衛台灣的決心，另外，也要歸咎於當時的台灣人菁英（仕紳）過度期待外力（英、俄、德）介入抗日，最後，也因為粵軍的燒殺擄掠，反而讓台北市民視日軍為平亂的王師。不過，台灣民主國的歷史記憶與台灣人認同的關係是什麼，作者並未著墨。編者大概也體會到日治時代的差別待遇，應該才是台灣人萌生自決意識的觸媒，可惜本書未加以處理。

相對地，專攻人類的學 Robert Edmondson 就具有較強的企圖心，嘗試著要把二二八事件與反對運動結合，也就是採取結構論與建構論合成的觀點，解釋民進黨如何在 1980 年代出現；不過，二二八事件畢竟只是引爆點而已，真正的族群分歧應該是國民黨政權全盤移入中華民國政府後，所進行的垂直分工統治。不過，作者雖然觀察到台灣人對於國民黨的中國化努力加以排斥，卻未歸納出此時台灣人對於殘留的漢人意識有何反思；此外，他對於「新台灣人認同」整合的期待，似乎也超乎選舉過後的真正發展。

社會學者許維德透過深度訪談，初步分析十四名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組織成員的背景，想要了解到底是宏觀的結構論、還是微觀的心理論，比較能解釋為何留學生會加入台灣民族運動。他的結論是來自台南／台中、以及家境較好的本省籍男性，比較傾向於會參加秘密的台獨團體。其實，真正能否證明這些運動者是否為邊緣人，並非他們目前的職業，而是他們出國前的家庭背景，特別是他們是否為二二八事件犧牲者的家屬，或是父執輩是否遭受到「耕者有其田」、或是「四萬 [舊台幣] 換一元 [新台幣]」等相對剝奪。

高格孚以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民主化過程為脈絡，來看台灣化／本土化／地方化的努力，是如何轉換台灣人的民族認同。他考察的核心是三民主義教條的分崩離析、強人蔣

介石銅像一鞠躬下臺、認識台灣教材的推動、以及紙鈔圖像的更易，是如何在過渡時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政治社會化上的功能，來達到推動「軟性的台灣民族主義」的目標。

社會學者李廣均以鏡子、以及面具作比喻，透過訪談來了解外省族群如何來面對台灣化的壓力。首先，他發現集體記憶左右著外省族群的中國人認同，再來，返鄉探親有助於他們鞏固台灣人認同的確立，另外，學習「台語」（鶴佬話／福佬話）可以用來進行防禦式的族群互動，而這些關連都顯現出世代上的差異。最後，他告訴我們，即使政府廢除了籍貫，第二代外省人仍然有認同上的困擾，特別是在社會經濟上的競爭。

政治學者林聰吉利用民調資料來分析省籍間的民族認同，發現外省族群的認同轉變較本省人還多，尤其是在 1995-96 年的中國飛彈威脅以後，另外，他也印證了一般人的看法，也就是族群差異與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有相關；當然，時間序列的實証資料也顯現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百分比在持續增加，而自認為是中國人的一直在減少。不過，受限於台灣人、以及中國人在概念上的含混歧義，相關問卷的效度(Validity)、以及信度(Reliability)，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

資深的社會學者 Robert Marsh，同樣地在探討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的關係，他的貢獻在於比較客觀的籍貫、以及主觀的自我族群認同，是否會影響其民族認同。不過，他所謂的自我族群認同／族群意識（中國人、中國人與台灣人、台灣人）很難與其他人所用的民族認同作區別；而他借自吳乃德的民族認同指標（中國民族主義者、務實者、台灣民族主義者），其實是看起來比較像是國家定位。作者最大的問題在於他是由他人的統計圖表進行次級資料來作分析，因而必須侷限於他人的指標在運用上的效度／信度，也就無法去考慮變數間是否也有線性重合(multicollinearity)。

再來，高格孚使用 178 種變數去了解外省族群對於民族認同的調整，特別是探究三個不同世代的外省人在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上有何差異。他發現，外省族群的認同包括漢人血緣、文化中國、以及居住／出生的台灣；不過，儘管他們已經台灣化，台灣認同還不是他們的民族認同。那麼，究竟他們的民族認同是什麼？高格孚認為既不是中國大陸、也還不是台灣，而本土化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又令他們愛恨交織。

政治學者吳叡人以「被動式的革命」來描述李登輝時代的民主化，並且使用「主觀力量」來解釋為何李登輝的獨台漸進路線，竟然攫取了民進黨的改革果實；具體而言，「李登輝主義」就是採用台灣意識來取得本土選民的支持，同時以生命共同體式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來進行整合，特別是外省族群。

政治學者林佳龍以民主化（拉力）、以及中國威脅（推力），來說明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如何轉變，也就是由族群式的漢人血緣／華人文化意識，逐漸提升為公民式的台灣政治認同。在這裡，他用原生／文化、地域／政治、以及主觀／心理三個指標，來解析了台灣人、以及中國人的內涵。最後，他根據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台灣獨立、現狀、中國統一）兩個面向，合成建構出選民對於建立民族國家的六種態度屬性。

## 參、綜合評論

整體而言，作者們大致上是採取建構式的觀點來觀察台灣人的認同，然而，民族認同的想像多少是建立在原生式的差異、或是工具性認知上的差別待遇，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台灣恰好提供最佳的「認同的實驗室」（編者言）；如果這三種途徑之間的關係能事先作初步的釐清，或許彼此在事後的實証就可以有更多的聚合。比較令人困擾的是基本概念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未能獲得妥適的界定，甚至於同樣的分類（中國人、中國人與台灣人、台灣人），竟然被當作迥然不同概念（民族認同、以及族群認同）的操作性指標。又如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概念，如果研究者本身對於其歧義未能有敏感度，很難想像受訪者的回答如何保證其信度？追根究底，如果我們真的要建立有效的時間序列資料，必須先全盤檢討相關名詞的定義，包括族群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以及國家定位。否則，再嚴謹的研究設計，充其量只不過是假內行在欺騙真外行罷了！

對於外國人來說，這本書以不同的面向來介紹台灣人在民主化過程中所面臨的認同危機，彌足珍貴。對於外國的台灣通，我們似乎能忍受他們對於中文／漢字文獻的生疏，畢竟，他們願意將台灣當作研究主題，就已經夠我們張臂歡迎了；然而，對於土生土長的年輕學人，在讀完這些用英文所寫的東西後，我們除了覺得不少地方似曾相識以外，如果不懷疑對於是否刻意避而不談國內已有的研究，只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也許，M. E. Sharpe 可以認真考慮是否開始直接翻譯台灣的相關出版品吧！